

致命弱点

拉维·巴拉里斯南、查德·斯坦伯格、司马喆

收入不平等 制约亚洲续 写增长奇迹

在过去的25年中，亚洲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区，许多人将未来贴上“亚洲世纪”的标签。随着该地区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其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也逐渐涌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中将加快向亚洲的转移。

不过，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与亚洲的增长如影随形，对该区域的未来发展前景带来了威胁。自相矛盾的是，亚洲的增长在降低绝对贫困的同时也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这种贫富的两级分化不仅为该地区的经济成就带来了污点，而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亚洲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将无法得以实现。因此，该地区的政策决策者正在寻求有效途径来遏制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实现包容性增长。

本文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公现象逐步恶化的原因、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为提高亚洲增长的包容性可以采取的措施。

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

整个社会关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不应该仅局限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还应该考虑到其更加切实的影响。

对于给定的增长率而言，分配不公日益严重通常意味着减贫力度的减弱。大量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收入差距与经济形势的恶化（如增长率降低、波动性

加剧等）具有相关性。在基本层面上，通常认为收入差距会因限制社会中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原因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见“扩大还是缩小”，《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博格和奥斯特拉亚（Berg 和 Ostry, 2011年）在其近期著作中也认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概括性地衡量收入分配情况的最常用标准是基尼系数。该指数在0和100之间变动，其中“0”表示完全平等，即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收入，而“100”则表示完全不平等，全部财富都由一个人掌握。基尼系数越低，则收入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就越平等。在瑞典和加拿大等分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该指数在25—35之间，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集中在40左右。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则更高。

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长期变化情况可以显示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即该国的福利是否更多地被各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所分享。基尼系数的下降表示收入的分配正在变得更加均衡。

从更窄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比如位于最底层的20%人口，看看他们能够分享到多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我们可以讨论国民收入增长1%将会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其收入至少增长1%，则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具有包容

印度孟买的公寓楼和工人住房。

印度和中国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状况

自从中国和印度分别于 30 年前和 20 年前开始实现经济腾飞以来，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至 90 年代中期的下降速度是最快的，这得益于农村经济改革、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的获得。1981 年，中国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84% 的人口的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贫困比例之高，居全球第五位。到 2008 年，贫困人口比例为 13%，远远低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印度也实现了减贫，但速度低于中国。1981 年，60% 印度人口的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贫困人口比例低于中国。到 2010 年，其贫困人口的比例降至 33%，但比中国的贫困人口

性的。但是，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不足 1%，则经济增长不具包容性，因为经济增长使这部分人群更加贫困。

亚洲创纪录增长背后的瑕疵

在过去的 25 年中，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其他新兴市场。这样的快速增长显著降低了绝对贫困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的人口，每天生活费在 1.25 美元以下）的数量，由 1990 年的 15 亿多人降至 2008 年的 8.5 亿多一点，几乎减少了一半。尽管亚洲在减贫方面的整体表现不俗，但该地区依然生存着全球 2/3 的贫困人口，其中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就占了几乎一半（见专栏）。

此外，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整个亚洲有增无减。对于该地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与 1990 年之前持续 30 年之久、引人注目的经济起飞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实现经济平等增长”是那一时期的主旋律，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相对较低水平的分配不平等（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分配不平等的下降）结合在一起。因此，亚洲近年来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不良记录与之前相比是个巨大的倒退。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 25 年中，亚洲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甚于全球其他所有地区（见图 1）。在中国和东亚尤为突出，该地区的基尼系数多处于 35 和 45 之间，不过这依然低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上述地区的基尼系数都接近 50。但在过去的 25 年间，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却逆全球趋势而行，总体上降低了分配不平等，缩小了与亚洲之间的差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亚洲居民的购买力已经提高，但处于最底层的 20% 人口的收入增长并没有达到其他阶层的增长幅度（见图 2）。这在包括中国和大部分南亚等欠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香港、韩国、新加

比例还是高出 1.5 倍。

不过，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上述两个国家中均有所加剧。根据官方估计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指数为零时表示收入分配最为公平，指数为 100 时表示最不公平）从 20 世纪中期的 37 上升至 2008 年的 49。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2 年）的资料，印度的基尼系数也从 1993 年的 33 上升至 2010 年的 37。同时，基于性别、种姓以及社会服务的获取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中国和印度的整体不平等之中，有 1/3 至 2/3 反映了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坡、中国台湾等更为发达经济体中均为如此。亚洲的经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拉美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自 1990 年以来，拉美经济体中最底层的 20% 人口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阶层。毋庸置疑，亚洲在过去 25 年中在增长率方面居全球之首，但其增长的性质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大概是最不具包容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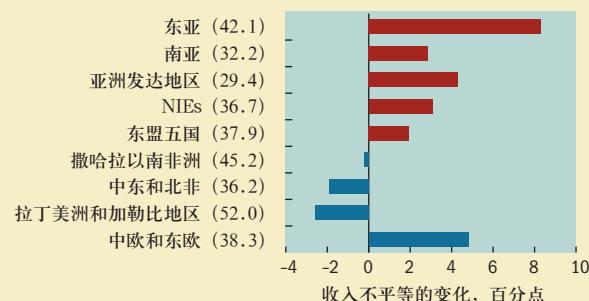
欠缺包容性

在过去的 25 年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全球性的现象，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已成为常态。许多分析人士将基尼系数增长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任何单一国家均无法

图1

欠缺平等性的增长

在过去的 25 年中，亚洲的收入不平等恶化速度超过了全球其他任何区域，尽管其收入不平等总体水平低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各国当局；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世界银行，PovcalNet 数据库；IMF 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变化反映了基尼系数的点变化，按人口加权。基尼系数在 0 至 100 之间，0 表示完全平等，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收入；100 表示完全不平等，其中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NIEs 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东盟五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括号中的数值是最近的基尼系数。

控制的国际性力量，如全球化趋势和更加青睐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

亚洲的经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的不同之处说明，除全球性因素外，亚洲的增长可能存在一些导致该地区收入不平等恶化的特定因素。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特定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获取等，针对这些因素作出改进可能会扩大亚洲增长受益的惠及面，并进而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加教育支出、提高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

亚洲财政政策的再分配影响受到较低的税收/GDP之比的严重制约。

的收入比重以及出台改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政策等均可显著提升增长的包容性，即当平均收入上涨时，最贫困人群收入的上涨幅度。亚洲在上述许多领域均处于落后状态。

由于政策选择的原因，社会部门的公共支出处于低水平：亚洲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相对较低，这说明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政策）在增强包容性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见图3）。据估计，在发达经济体中，税收和转移政策（如那些针对福利和失业的政策）通常可以将收入不平等降低1/4左右（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相比之下，亚洲财政政策的再分配影

响受到较低的税收/GDP之比的严重制约，亚洲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平均仅为发达经济体的一半，在所有发展中地区中处于最低（Bastagli、Coady和Gupta，2012年），这导致该地区极低的社会支出水平。对累进程度不足的税收和支出工具的更多依赖也使收入不平等加剧。在亚洲，对商品和服务消费所征收的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一半，而该比例在发达经济体仅为1/3。此类税收更多地由穷人承担。

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大幅下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12年），过去20年间整个亚洲的劳动力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显著下降，而资本所占比重相应上升，平均值约为15个百分点。这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因为资本收入通常为富人所得，而在正式部门就业的贫困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技术进步也是资本在国民收入所占份额增加的部分原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增长不再像过去那样引发劳动力需求的大幅上涨。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变化可能也与亚洲部分地区对具有高资本劳动比率的产业的特殊偏爱有关。这种产业上的倾斜体现在上述地区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政策，与其快速增长率相比相对较低的就业收益以及财富集中在企业而非居民手中等方面。此外，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与劳动者相对较弱的议价能力有关。在亚洲，许多劳动者在管理不规范的非正式部门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收入水平不高。此外，即使在正式部门，低技术劳动者在提高相对工资方面也基本没有议价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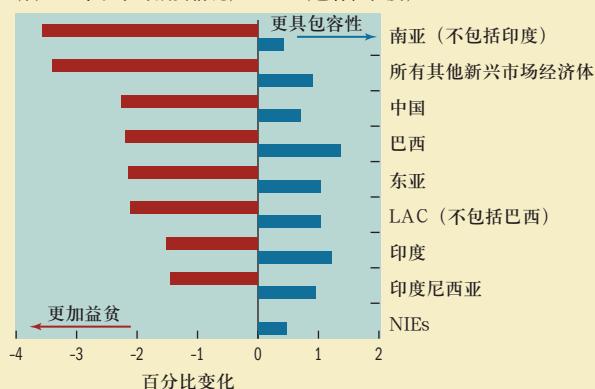
金融服务覆盖很少：缺乏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是亚洲许多地区的一个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超过一半的人口以及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保险以及证

图2

不成比例的改善

尽管亚洲的增长促进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但在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相对地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

（自1990年以来的减贫情况）
（包容性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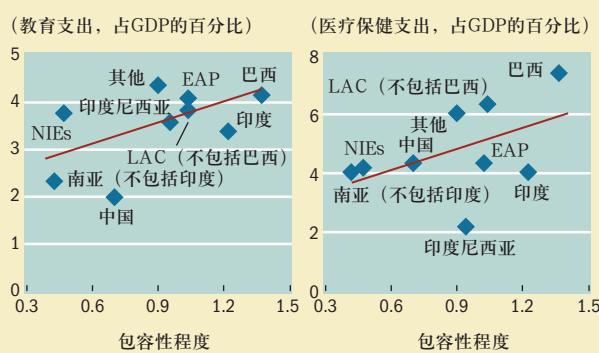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佩恩表7.0；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红条代表增长的益贫程度，也就是说整体人均收入增长1%会带来多大的绝对贫困（人均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减贫影响。没有NIEs的相关数据。蓝条代表增长的包容性程度，及整体人均收入增长1%会对最贫困的20%人口带来多大的收入变化影响。东亚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图3

增加支出以改善收入不平等

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增加支出有助于提高社会最贫困人口的相对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EAP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他”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包容性的程度反映总体人均收入变化1%对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

券等正式金融体系的服务。有关研究显示，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分配的均衡性。这是因为，缺乏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以及与交易和合同执行相关的成本对贫困人口及小企业主最为不利，这部分人群通常缺乏抵押品或信用历史以及业务关系。上述不足之处导致贫困人口几乎无法获得融资，即便他们掌握着高预期回报的项目也是如此。通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开发（如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应对意外事故或死亡的保险产品），政府既可以促进增长也可以帮助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改善绩效

那么，在此基础上采取什么类型的政策能够帮助亚洲经济体纠正近年来增长缺乏包容性这一问题？

财政政策：亚洲各国政府在保持财政审慎的同时，必须提高在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来实现，尤其是通过更具累进性的税收体制或者通过增加直接税基来扩大财政政策在重新分配方面的影响。同时，应增强针对弱势家庭的社会支出。在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如要求家庭遵循社会所鼓励的特定做法，例如提高就学率或接种疫苗）的应用在不断增加。巴西的“家庭补助金”和墨西哥的“机会”计划是其中两个规模最大的，在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方面被公认为是成功的计划。

劳动力市场政策：改进农村就业计划的劳动力政策可以提高正式部门的就业人数并降低非正式部门的规模，消除劳动力流动性的阻碍因素以及改善劳动者

的培训机会并提高技能，从而可以向低技能人员提供政策倾斜。此外，一些国家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度并提高最低工资，这也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提供了支持。例如，中国于2013年2月公布了一项包含35个要点的计划以应对收入不平等，其中的一条指出将于2015年之前在大多数地区将最低工资提高至平均工资的40%以上。总之，我们发现包容性与就业保护程度以及最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见图4）。

金融服务：基于国际经验的建议包括通过促进农村金融提高信贷的可及性、发放微额信贷（针对小型初创企业的小额贷款）、为贫困人群贷款提供补助、促进信用信息分享并为初创型企业培育风险资本市场。

坚持到底

如果亚洲国家采取政策措施来扩大增长的惠及面，尤其是通过提高医疗保健和中小学教育的支出、强化社会安全保障网、为低收入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市场干预以及增强金融服务方面的包容性，则这些国家有可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

许多上述政策还可以同时降低对资本和大型公司实体的青睐，扩大经济增长给居民收入和消费带来的益处。如此一来，这些政策也可以促进亚洲的经济模式发生必要的改变，从外部需求驱动转变为内部需求驱动，这将使该地区的增长奇迹持续更长时间，并为全球的再平衡做出贡献。这么做意义重大。如果亚洲不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纠正，则该地区将很难在未来数年中继续保持其高增长率，也无法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地位。■

拉维·巴拉克里南（Ravi Balakrishnan）是IMF西半球部副处长；查德·斯坦伯格（Chad Steinberg）是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司马喆（Murtaza Syed）是IMF驻中国副常驻代表。

本文基于IMF 2013年的工作论文“*The Elusive Quest for Inclusive Growth: Growth,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sia*”。

参考文献：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Outlook 2012: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Manila). 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2-confronting-rising-inequality-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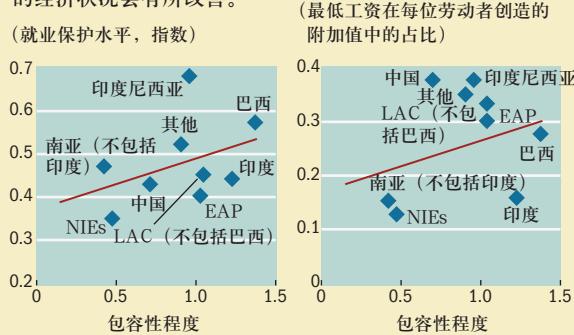
Bastagli, Francesca, David Coady, and Sanjeev Gupta,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2/sdn1208.pdf

Berg, Andrew, and Jonathan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sdn1108.pdf

图4

劳动法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就业保障力度较强，同时最低工资水平较高时，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会有所改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

注：就业保护指数所衡量的是劳动法的保护作用，是替代雇佣合同、额外工作成本、员工雇佣成本和解聘程序的平均值。EAP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他”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包容性的程度反映总体人均收入变化1%对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